

众生丛
新闻眼系

采访死亡手记

● 沈英甲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采访死亡手记/沈英甲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6.8

(众生丛书/曹志前主编)

ISBN 7-5059-2499-0

I. 采… I. 沈…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N.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5213 号

采访死亡手记

沈英甲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文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2 插页 213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

ISBN 7-5059-2499-0

I·1847

定价:14.40 元

目 录

1 / 总序

1 / 阴阳界纪事

55 / 终极诊断
——人体病理解剖的现状

113 / 寻求梦境的一群
——“挑战者”号罹难前后

126 / 她们见到过死神
——日航班机“8. 12”空难记

137 / 死刑古今谈

287 / 死而复生之谜

290 / 我们能延续生命吗？

阴 阳 界 纪 事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人总是要死的。据学者们推算，自猿演变成可以称之为“人”的动物以来，已有 800 亿个个体成为百代逆旅之客，历史长河的游子。今天仍健在的是不到 60 亿，就是说其中绝大多数已回返大自然，他们重新化为泥土、矿物质、元素……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脚下的尘埃里，在我们吸入的空气中。一个庄稼汉随手投入炉灶的一根柴禾里也许就有几千年前组成一个窈窕淑女发丝的物质。再撩拨人心的激情，再缠绵悱恻的幽怨，再没齿不忘的恩德，再不共戴天的仇恨，全都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事人的离去，烟消云散。正因为这样，新生命才能毫无顾忌、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地面世。

产房和太平间象征着人生的起点和终点，产房里有的是甜蜜的微笑、明亮的阳光、美丽的花束、温柔的爱抚；而太平间里有的是凄冷、阴森、恸哭的死寂。多少年来，社会为新生者做了很多很多，而为融入永恒者做得很少很少。科学昌明，文明进步，可是太平间令人吃惊的现状使我们引为自豪的科学、文明之盘仿佛缺失了一角，给许许多多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留下了永久的缺憾。对太平间的采访给笔者的震撼是强烈的，进而想到如果不整修好这缺失的一角，对任何人来说，人生都不能算是美好的。因为不管愿意不愿意，除非特别的意外，绝大多数人死后都要在太平间做短暂的停留。

一次偶然的经历，引发了笔者对一些医院太平间的“穿

梭”采访。

一、太平间惊梦

1991年暮春时节，笔者在京郊D医院住院检查。病区的正门斜对着太平间的后门，包括一些医务人员在内，患者就不用说了，对这种带有“暗示性的”布局很反感，凡出入病区正门，眼光前伸十数米，尽量避开太平间的墙壁和铁栅门。然而顾此失彼，自从太平间建成以来就未曾更新过的冷冻机疲惫不堪的噪声却敲打着耳鼓，好像是在提醒，太平间到了。

像家用电冰箱一样，冷冻机的散热部位在机器的屁股后面，设在室外。由于机器太旧，可能为了下次检修方便，冷冻机上的各种线路、管子勉强用铁丝固定着，晃晃荡荡，远看过去像是一张破网。盛夏里要是冷冻机坏上几天，对病房来说无异是一场灾难，空气里一缕缕挥之不去的臭味儿，让人躲都没处躲。一盏昼夜长明的电灯泡在破网上摇曳着，把这张破网的影子从地面一边推向另一边。这场面在晚上望去，恐怕会给人造成种种联想。

冷冻机年久失修，经常停转，修理的时候，尸体就从冷冻机里搬出来摆在地上，我曾隔着铁栅门看了几眼：湿淋淋的水泥地上几副睡着死者的担架横着、竖着。

一天午后，大概有一点多钟吧。我发现两股夹带着血水的污水从太平间台阶上流下来，铁栅门开着，这说明中午前后太平间里做过尸体解剖。好奇心使我鼓起勇气走进了铁栅门，过道里一副担架上躺着一个不知性别的老者，因为他（她）的一只手从白色罩单下伸了出来，手指苍老得像几根枯黄的树枝。走过过道就进入了太平间，突然来到暗处眼睛还不能适应，几秒

钟后我才看清，这间大屋子的正中是一个脏乎乎的水泥台子，就像五六十年代副食商店卖肉的水泥柜台，上面躺着一个死人，身体用白罩单盖着，脚边是一团染着污血和污物的棉花、纱布。我估计，被开膛的就是这个人了，流向屋外的血水大概就来自这里，橡胶水管一冲，水就流向了过道的外面。还有一个人与这具尸体并排，躺在一副担架上，穿一身蓝制服，还戴一顶蓝帽子。可能是刚过世的，冷柜里没地方了，只好排队等一等，我想。

太平间还有一扇通向院子的大门，周围十分安静，这时我才闻到阴冷的空气中有一股说不出的臭味儿。我走向大门朝院子里望了一眼正要转过身来，突然身后“噢——”地一声长吠又凶又恶，来不及判断，我一个“仙人拐”出腿向后猛扫，但未获战果。扭头看去，门边一只愤怒得直皱鼻子的大黑狗正前爪伏地做欲跃起状，不过跃不起来，有一根铁链正管着。这时我才看清，院墙下面阴凉处大大小小有一群狗或卧或站，漫不经心地看着我，仿佛在老练地冷笑。相形之下，这只乱咬乱叫的大黑狗显得嫩了点儿。心跳刚刚转匀，我正要原路退回，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那个躺在担架上的“蓝衣蓝帽”从容地坐了起来，我的所思所想好像一瞬间被抽干了。只见他朝过道一指，嘴里说着什么。待我来到铁栅门之外，被阳光刺激得眯着眼睛时才明白过来，那“蓝衣蓝帽”是太平间的管理者，他说的是“出去，出去”。狗叫声搅了他的午睡。

后来才知道，北京不少医院的太平间，凡是有一个单独院落的大都养着狗，目的是防人骚扰。一些院子临街的太平间门窗玻璃常被行人扔石头、砖块砸碎。像H医院的太平间从未有过一块完整的玻璃，不得已只好把临街的一面玻璃窗全都用板条钉上，这样太平间的光线能好吗，不透着阴森才怪。据住在

H 医院附近的居民讲，这家医院太平间接长补短地焚烧截肢下来的患者肢体，断臂折腿什么的，有时候还烧死孩子，那味儿真能把活人熏死，不砸它砸谁。不过，他们都不承认扔过石头。扔石头的目的是迫使太平间迁址，谁也不愿意晚上跟死人当邻居，睡在死人旁边。而医院方面难在随着人口多年膨胀，医院已成居民区里的孤岛，医院里死人是常事，有的死人由于种种原因还不能马上拉去火化，太平间是必不可少的设施。

“太平间能放在医院显眼的地方吗？当然是离活人越远越好。”X 医院年轻的陈医生说。于是最远的地方就是医院的院墙了，而这里又离行人和左邻右舍近了。

D 医院太平间院子外就是一条大马路，终日车水马龙，甚至半夜里都不清静。院门外边不知是有关方面有意还是无意，一溜摆着十几个什么时候都满满当当的大垃圾桶，大热天臭气熏天，下雨天污水横流，行人皆掩鼻屏息匆匆而过，无形中给太平间起了掩护作用，否则太平间玻璃不知要挨几多砖头、石块，那群狗要是不答应，还可能演出流血事件。

看来我在 D 医院太平间闻到的臭味儿来源有了下落，一是太平间里终年不见阳光的腐霉味，一是垃圾桶的臭味儿，还有一种是后来 D 医院清洁工告诉我的，腐尸味儿。中国的初生儿死亡率是低的，够得上世界先进水平，可与发达国家相媲美，但是 1000 个里头总要死上个把十几个的，这长不盈尺的小尸体送火葬场是要交钱的，在讲究经济效益的今天显得不大合算，于是就顺手埋在院墙下面。狗鼻子灵，尸体一腐败，它们就先闻到扒出来分食了。让这样的狗咬一口是什么后果，只有天晓得了。

医院如今的设备竞相向高精尖看齐，真有如今天人们对吃的“食不厌精，炙不厌细”。可是在我采访的多所医院里许多年

来，除了太平间随医院一起建成外，再未投入一文钱。人死如灯灭，为死人过多的花钱确实不值得，但是太平间设备老化失修，由此造成的严重的后果，如尸体腐败甚而生蛆，受刺激的却是活人，这种情况在不少医院太平间中都不同程度发生过。

二、“好汉子不干，赖汉子干不了”

现在提倡的时尚是转变观念，观念转变对了，不能干的事就能干了，不敢干的事也就敢干了。我琢磨，对于现年 82 岁的侯师傅来说，他 60 年前在永和棺材铺当扛夫时，很可能有过这种观念的转变，否则他现在不会一边帮助解剖尸体的病理科医生整理尸体内脏，一边用指甲剔牙，“蓝衣蓝帽”也不会在太平间里舒服安稳地睡午觉。

“死人比活人干净。死人不喘气，没毒。”侯师傅在给一具尸体整容时头也不抬地说了这句经得起推敲的话，听起来像一句格言。

侯师傅对太平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应当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他是目前健在的中国殡葬业的“宿将”之一，82 岁年纪与死尸打了 60 多年交道。当扛夫时经他肩膀抬过的尸首就有军阀、官绅的，也有平民的，整个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全装在他脑子里。他是如今北京城年纪最大且在职的前扛夫、前火化工、太平间管理人。

兴许是一辈子见死人见得太多了，见笑脸太少了，我初次见侯师傅时发现他脸上始终没有什么表情，谈不上冷峻，也说不上什么热情。

第一次通过 K 医院宣传部门介绍去“穴居”在这家医院地下室尽头的太平间时，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整个地下室空空

荡荡，只听地下室天花板下的一根根管道有时发出丝丝的漏气声。走廊里没有一个人，我必须走过一二百米长的走廊，走到走廊尽头的太平间才能见到侯师傅，他现在就在那儿。不知什么念头使然，我把随手带的提包放在地下室门口，低头看了看脚上的“巡洋舰”的鞋带是否牢靠，尽管地下室里不大可能养狗。

“巡洋舰”在水泥地上发出轧轧声十分悦耳，有了D医院那番经历，走这段路倒也算不得什么。“死人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活人”。我想起了这句话，不知是谁说的。

太平间的大门虚掩着，露出一线昏黄的灯光，凑到门缝上去看，那电灯泡顶多有60瓦，把这亮光分配到这么大个房间，其昏暗程度可以想见。由于事先打过招呼，侯师傅也不意外。我和侯师傅握了手，他那手又软又暖，就像捏住一块阳光下晒过的海绵。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制服，戴着一顶黑色涤卡帽子，打扮竟与D医院太平间那位“蓝衣蓝帽”有异曲同工、不谋而和之妙。

他正在给躺在太平间右侧一具木架上的老太太遗体化妆。79岁的老太太是不是年纪太大了，整个头颅变得奇形怪状，支支楞楞，五官极度夸张，右嘴角边露出两颗大牙，像是不出声地在笑，令人毛骨悚然。她身上盖着一床花纹十分古老的夹被，显然是新做的，头上顶着一个我在50年代常见老太太戴的那种黑绒帽。我邻居一位家委会主任就戴过，她早这个老太太30年便过世了，眼前的情景使我想起了她。因为她曾阻止我去看附近一个丧家请和尚吹吹打打超度亡灵，那是60年代初一个夏天晚上的事。当时已经在提倡“革命化”了，和尚吹奏的乐曲虽然由于各种响器音调不大和谐，仔细辨认居然是“红色娘子军”、“社会主义好”一类情绪高昂的曲子。一连热闹了好几天，

我也看了好几天热闹，末了一两天我发现棺材底下不住地“漏水”，还有隐隐地一股臭味儿。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和尚为死人念经，因为没过多久和尚们就没这项“业务”了。

像这种把丧事搞得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看上去像办婚嫁喜事的习俗，源于中国传统中对“白事”的理解，所谓“白事”，是指丧仪所着衣物、所用器物多为白色；“红事”是指在婚嫁中多点缀铺陈红色，是所谓“红喜事”。老人寿终正寝，民间称为“喜丧”，丧仪也就成了“白喜事”。早些年，北京农村常见村子东头办“红喜事”，村子西头办“白喜事”，单从吹鼓手弄出的动静，远远听去还真弄不清哪边是“白喜事”，哪边是“红喜事”，一样鼓乐喧天，一样亲友盈门。一位研究丧葬习俗的专家这样描述红白喜事：丧葬与婚嫁同为喜事，在本质上一致，只是色调有区别而已。婚嫁尚红，丧事尚白，群众认为喜事就要红火、热闹，丧礼也应如此。一旦讣告之后，整个村子就要热闹起来，人们谈论死者活着时的情景，品评他活着时的为人处事，夸赞或谴责死者的儿孙，议论媳妇对死去的公公如何……本家、邻里都忙碌起来，出工的、助钱的、解物的、操办酒席的、帮助接待客人的、掘土打墓的，人们兴奋地投入丧礼活动中。死者近亲虽然悲哀，但老人寿终正寝安然度过一生，也少了晚辈的负担、拖累，所以也算作喜事，尽可能把丧事办得体面些。婚嫁有鼓乐，办丧事也有鼓乐，一班吹鼓手不够请两班，通常要搞得通宵达旦，原先吹些“哭皇天”、“小寡妇上坟”等传统曲目，后来也吹些时兴的曲调。周围人流如堵，把丧仪场地围得水泄不通，人声鼎沸十分热闹。丧仪之初儿女、亲属也要哭、子女接到讣闻后先要哭悼，再问明死因，然后专事奔丧，到家之前要“望乡而哭”。出嫁之女要一路哭着走来，当然这是指从彼村到此村，而不是现在通常理解的从彼省到此省，

真是这样恐怕赶不到家了。

根据丧仪习俗，对死者如果没人哭丧或哭得不多、哭得不够卖力气，人们就会认为死者的人缘可能不大好或是子孙不孝。该哭的人不哭，被认为不知礼、不孝顺，要受到讥讽。哭的方式也挺多，男子多“泣”，妇女则要哭出声来，得有词有调，得让人听出内容，不外死者的好处和留给活人的难处。没有哭丧任务的人就在一旁烧纸钱。

这种丧仪其实是一种根深蒂固沉积于历史的文化现象，尽管科学技术把历史推进了新的文明时代，我们还是不难从今天从简的丧事中看到当年丧仪的影子，甚至原始祭祀的影子。

侯师傅在老太太脸上涂了红色的脂粉，又打了厚厚一层甘油，在昏黄的灯光下，倒也泛着光彩。

天花板上什么地方在滴水，这不，掉到我耳朵上，“咚”，声音大得出奇。抬头看去，上面有一个足球大的孔，像一只黑洞洞的眼睛，水就是从那儿滴下来的。地面上左右各一滩汪汪的暗红色液体，在灰色的水泥地上格外醒目，我不想猜那是血水、药水，还是体液……小心绕过去。要是当时那盏可怜的灯泡灯丝点到了头，或者突然断电，侯师傅的眼睛真像人说的那样发出幽幽绿光的话，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为了拍摄几张现场照片，我几次请侯师傅摘下帽子，后来我实在不好再麻烦他，他倒满不在乎，“摘帽子费什么事，抬手的事”，说着把帽子放在老太太脚边。他说话不多，眼里有老辈靠手艺、出力气挣饭吃的人克尽职守、慎于言敏于行的神情。

侯师傅依次查看了正睡在冷冻柜“大抽屉”中的尸体。左上方第一层“大抽屉”里躺着一位“副司令”，死亡标签上写着“副兵团级”，官不小。他下面是一个被人用刀捅死的某单位的保卫人员，刀子刺穿了他左腿动脉，在来医院路上 20 分钟里血

就流尽了。他腿上的伤口向外翻着，已做过解剖，由于尚未结案，一时还不会火化。一双漠然半睁的眼睛，凝结了他生前的愤怒。再下面是一位战士，他在检修电梯时被挤死。侯师傅说他是“英雄人物”，当天下午他本应复员返回家乡。从这个战士脸上的化妆可以看出，侯师傅是很用心的，因为战士脸上脂粉涂得太厚，脸红得就像京剧里的关公。

右边第一层里睡着两个小孩，一个12岁死于先天性心脏病，一个是刚出生的婴儿。死于心脏病的男孩安详地闭着眼睛，一头黄色的卷发盖着惨白的前额，太不幸了。侯师傅怜惜地伸手盖好孩子尸体上的罩单。婴儿的父母现正为了婴儿的死与院方交涉，也要讨个“说法”，不依不饶。在他们下面是一名经济师和一个山西某地区的干部。

副司令和婴儿死后躺在一个冷柜里，是他生来未料到的。在人生终点，大家在人格上恢复了最初意义上的平等。婴儿对这个世界是无所求了，而司令员却不，死后一个多月了，可能有些事情还未“落实”得令家属满意，迟迟没有火化。K医院有人认为“这是死人压活人的典型”，侯师傅也有看法，不过“我不管这个”。他倒是一视同仁。

又过了两个月，当我欲结束采访去看望侯师傅时，这位副司令仍躺在大冰柜最上头的抽屉里。他的邻居来了又走了，换了一个又一个，干净利落地返回了大自然，他安之若素。“难违一官之小情，则为万民之大弊”。古训言之灼灼不可不察。

为了拍下侯师傅干活的场面，我试着找了几个角度都不合适，觉得合适的地方刚好要踩在那两汪积水里，我只好把躺在太平间左边木架上的一个老头的双脚挪开站了上去。这个老头80多岁，整个脑袋缩得像个扎紧的布口袋，只是头骨外面包了层皮，一副骷髅的模样。

通常处理尸体的过程是这样的，在死者“走”前两天从冷冻柜里搬出来化冻，用白酒擦身体促进其化冻，化开后再穿衣物。涂脂抹粉整容是在穿好衣物之后，胭脂是太平间管理人自备的，不过不是所有管太平间的人都会这门手艺，像侯师傅这样的人不多。颜色得根据死者脸色上，脸色发白的就多上点儿。活做完后让丧家看看是不是满意。

按照殡葬服务的有关规定，给死者遗体化妆整容的人，得具有一定医学、化妆、防腐方面的知识，凭着侯师傅这一辈子经验，虽说没受过专门训练，但比上过专门学校的人也未见得差多少。他得给遗体洗净，让死者躺在那里四肢伸直显得平稳安祥，然后再给死者面部施以脂粉，看上去比活着时还有光彩。像那位被电梯挤死的战士，整容化妆就麻烦得多。侯师傅得为他擦净血迹，修补破损的肢体和面容。由于战士头颅已经变形，侯师傅找来棉花衬进已塌陷的颅骨，先支撑起来再用力按一按捏一捏，让死者恢复生前的模样。

在八宝山公墓的整容室，一天下午我正在采访劳动模范刘瑞安，这时担架推来一个刚从11层楼上坠落的儿童。据陪同的邻居说，这个12岁的男孩，智力发育不全，他是从11层窗口爬出落地身死的。当打开裹着这男孩的被子时，我们都被这场面惊呆了：男孩的眼睛、口鼻、耳朵还在向外流血，胳膊、大腿已摔成几截，只有皮肉连着，一段沾着筋肉的骨头从他臂弯处冲破皮肉突露在外面。男孩的头部完全变形，左侧头部肿起一个巨大的包，估计这是最初触地的地方。邻居也觉得没有抢救的必要了，就直接送到了八宝山。我曾轻轻触摸了一下男孩——他还有体温。直到尸体处理完毕，我始终没有见到男孩的父母赶到。为这种死者化妆是很不容易的。刘瑞安告诉我，每年不知有多少因车祸、工伤，甚至刑事案件的牺牲者，经他之

手整容，否则连告别仪式都搞不成。

为老太太整完容后，侯师傅从制服口袋里掏出一盒胭脂让我细看，打开看去里面有一红一粉两种颜色的粉饼。这是他自备之物。他说，给“要走的人”化妆，先是用深颜色打底，然后用粉扑抹匀，再用浅颜色的找补一下，涂上甘油就差不多了。给死人化妆，当人前都说不出口，这行当不好干。“好汉子不干，赖汉子干不了”，侯师傅坐在他那间门上写着尺把大“44”的小屋板凳上，抽着“黑烟”（他称天坛牌雪茄为“黑烟”，这种廉价香烟每支都是黑色的，他还非“黑烟”不抽）说。“44”就这么凑巧。

我小时候听人说过“炸尸”的事儿，挺吓人的，信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究竟有没有也没听出个道理。跟死尸打了60多年交道的侯师傅在解释这一传说时，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炸尸”这种事跟时辰有关，刚好在去世那个时辰有猫或耗子打尸体上过，这具尸体就站起来了，抓住人不放，这会儿赶紧扔给他一个枕头抱住，他就会安静地躺下。

人类登上月球快30年了，现在人类也知道人体的微观内有遗传基因，也估计在无边无际的宇宙里还有比我们还要高明得多的外星人，但是最说不清的还是“灵魂”或者说“鬼魂”了。原始社会时，史前人类认为草、木、水、火、风、石……全都具有灵性，人死后还有灵魂在，所以有人做了亏心事就怕遭到鬼魂的报应，杀人犯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传说中鬼有三种，一种是死鬼，也叫幽灵；另一种是小鬼，索命，如传说中的“无常”；还有一种是活鬼，也就是僵尸，如吊死鬼、溺水死的水鬼、冤死鬼、饿死鬼……等等，最大的鬼恐怕要算阎罗王。阎罗王手下的鬼各司其职，一如活人的社会，说起来也是从社会生活演绎而来。

“灵魂”的说法是全世界通用的，没有哪个民族可以例外。根据共同认可的说法，人活着的时候，人的灵魂与肉体同在，肉体死后，灵魂便飘逸而去，到哪里去了呢？这种说法就不大相同了。佛教有天堂、地狱之说，有轮回之说，基督教也有天堂、地狱之说，却不讲轮回。而且根据传说，灵魂有善恶之分，它们也能对人世间的种种事情做出反应。于是中国民间也就有了小孩挂的“长命锁”，也就有了门框上挂的“照妖镜”，也就有了避邪的“护身符”一类物件。

据说有个国家的科学家为了证实灵魂的存在，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将一个临终的人安置进一个能度量重量的容器，如果此人死后体重无丝毫变化，就说明不存在灵魂或灵魂本身没有质量，只是一种精神方面的东西。如果此人体重骤然减轻，那就肯定说明他死后有什么东西离他而去，那很可能就是灵魂。实验结果表明，在此人死后体重很快就减轻了，而且具体到多少多少克——这就是灵魂的重量。不知还有没有人重复这个实验，至今还没有见到有人出面辟谣。我倒很想重复这个实验，如果真的发生这种现象，而且是发生在死者“脑死亡”的那一瞬间，就算不是灵魂脱窍而去，也有推敲的余地了。

佛教、道教在我国古代流行之后，也影响了民间的丧葬习俗，开始出现设斋诵经超度亡灵，打醮做佛事，跪拜祈祷这类仪式，就是要让死者的灵魂能顺利尽快地到达它该去的地方，否则活人就不得安宁了。此外，对长辈死去搞好葬仪，据说还能得到祖上的荫庇，给子孙后代化灾消难。至于“炸尸”这事儿我曾请教过侯师傅。

“您亲眼见过吗？”

“没亲眼见过，也是听人说，有见过的。”

“……”

他也听说了 60 多年，有“亲眼见过”的不妨站出来描述描述。

三、往事如烟

在这间四处堆放着丧家送来的一包包衣物的小屋里，侯师傅慢慢悠悠地给我讲了一些他那辈“抬尸人”的往事，语气平缓而从容，这是一个早就与世无争的老人心态的表露。

解放前，他干的这行被人称为“扛大杠的”，也叫“杠夫”。穷到当杠夫抬棺材的份儿上，那就是穷到底儿了。他先是在西斜街（现丰盛胡同中段往南）给人家倒泔水，然后去“巡捕阁”（派出所）领钱。倒泔水活不下去，这才去抬了棺材，那会儿抬一次给 60 个子儿，也就是 6 吊钱，挣了钱买棒子面回家蒸窝头吃，下顿饭还不知在哪儿。他还拉过洋车，受的欺负“就不用说了”。侯师傅叹道，再不说就没人知道了，全忘光了。他当然不是说自己全忘光了。

那会儿抬大杠的没多少“专业”的，大都是散居北京城各处，哪天杠房有出殡的活儿，“杠头”一张罗就把人找齐了，有点儿像今天文艺界的“走穴”。

今天人们常听说的“殡葬”这两个字，在古代各有所解，“殡”指的是停柩，《礼记》中就有“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周人殡于两阶之上”的语句；而“葬”指的是藏，《礼记》中写道“国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是故，衣足以饰身，棺周于衣，槨周于棺，土周于槨。”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提到殡葬，就把处理死者遗体、对死者的哀悼（发讣告、遗体告别、追悼会、送花圈挽联、出殡送葬、安葬、安放骨灰盒，乃至接送死者遗体）全包括进去了，形成了今天的殡葬行业。

几十年前北京有不少杠房，也有的叫棺材铺。像宣武门外的天源杠房，长安街上的日升棺材铺，缸瓦市丰盛胡同东口的永和棺材铺等都是规模较大的。侯师傅当年是在永和棺材铺里听差，店主是山西人，姓张，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被赶回了山西，料想今天怕已不在人世了。永和棺材铺还有个“堆房”，在丰盛胡同对面的大酱房胡同里，是专门制做、存放棺材的地方。西四十字路口西边路南也有一家棺材铺，直到60年代初还在，那儿刚好在二路（现102路）无轨电车车站旁边，站在车站电线杆旁，可以望见黑洞洞的门脸里面，露出几具大头朝外的黑漆棺材，由大到小排列着。这家棺材铺原先是卖劈柴的，到后来又卖“小匣子”，装死小孩儿的，长点儿的料就作了薄皮棺材。

侯师傅年轻的时候出殡扛大杠，通常是把棺材抬到阜成门外三塔寺，教堂后身一处叫石门的坟地，60年代初我还见过那座挺高的教堂尖顶，黄昏时分成群暮鸦呱噪，显得挺荒凉。这地方相当于今天市委党校南边一部分。那儿有看坟的人管着，埋一个大人收三块大洋，一个小孩收几毛钱。

送葬的场面今天的年轻人不大知道了，侯师傅说“挺有讲究”。那时候，出殡的日子要先请算命先生算好。在这之前，死者遗体要停放数日，叫“停丧”，一般五、七、九、十一天。出殡这天，与丧家有关人等凌晨即起，先是起灵，由孝子背起棺材的大头，其他人分列棺材旁。一声吆喝，大家挺起身抬起棺木，捆绑好抬棺的杠子后，就要摔盆起杠了。摔盆的是死者的长子或长孙，如果要换人摔那就得是最近的亲属或是继承人。瓦盆必须一下子摔碎，而且越碎越好，这样才便于死者带到阴间。瓦盆摔碎后杠夫起杠，摔盆的人扛上引魂幡表示驾灵而行。出殡一行由孝子先行、灵柩和抱冥器的孝子、鼓乐手随后，殿后的是女眷。送葬途中有人沿路抛撒纸钱，意在买路送灵。这种